

## 伊斯兰思想

## 论哈桑·班纳的政治伊斯兰思想

胡 雨 欧东明

**摘 要:** 作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 哈桑·班纳的思想和实践在当代政治伊斯兰运动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班纳的政治伊斯兰思想主要体现在: 力图对伊斯兰作出整全性的解释, 以此为创造伊斯兰秩序提供思想根据; 提出了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纲领, 反对穆斯林社会的西方化、世俗化倾向; 力主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化, 注重圣战在造就伊斯兰国家中的作用, 并倡导世界范围的泛伊斯兰主义。本文通过对其思想的发掘和梳理以期更好认识当今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渊源和本质特征。

**关键词:** 政治伊斯兰; 穆斯林兄弟会; 伊斯兰秩序; 圣战; 乌玛; 伊斯兰思想

**作者简介:** 胡雨, 博士,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讲师,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特邀副研究员(四川绵阳 621010); 欧东明,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985工程“南亚与中国藏区创新研究基地”副研究员(四川成都 610064)。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0)01-0054-07

中图分类号: D73.64

文献标识码: A

哈桑·班纳(Hasan al-Banna, 1906年~1949年)是现代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奠基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The Muslim Brotherhood, *Al-Ikhwan al-Muslimim*, 音译“伊赫万”)的创始人及第一任总训导师(*Murshid*)。他的思想和实践对当今伊斯兰复兴主义运动具有开创之功。按照美国学者埃斯波西托的看法, 当代伊斯兰行动主义与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模式具有相互承接的关系。而这个组织的缔造者和宣传者哈桑·班纳对波及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运动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他是当代伊斯兰复兴思潮的开拓者或缔造者之一。<sup>[1]70</sup>与此同时, 班纳也是一个褒贬不一、难以盖棺定论的人物, 对他的评论之多, 意见分歧之大, 世所罕见。不少分析家认为, 班纳是政治伊斯兰狂飙的始作俑者, 而穆斯林兄弟会则是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渊藪。鉴于穆斯林政治在当今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而哈桑·班纳的思想构成了政治伊斯兰的重要理论源头和基础, 因此本文旨在对班纳的政治伊斯兰思想作一专题发掘和梳理。

哈桑·班纳于1906年10月出生在距开罗西北方约90英里的布海拉省(Buhayra)马赫姆迪亚镇(Mahmudiyya)。其父是当地清真寺的伊玛目, 家庭浓厚的宗教氛围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sup>①</sup>班纳幼年接受经堂小学(*kuttab* 库塔布)的传统教育, 1922年, 加入苏菲派哈萨非亚教团(Order of Hasafiyya Brothers)。该苏菲教团思想和组织结构对后继的兄弟会产生过重大的影响。1923

<sup>①</sup> 伊玛目是阿拉伯文 *Imam* 的音译, 伊斯兰教教职称谓, 意为“站在前列的人”、“首领”等。在伊斯兰教用语中, 伊玛目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指穆斯林集体礼拜时, 站在前面主持礼拜者; 第二层是指清真寺的教长。

年，班纳进入开罗达尔·欧鲁姆师范学院（*Dar al-'Ulum*）学习。该学院创建于1873年，是埃及第一所提供现代教育的高等学府，迥异于传统宗教教育的爱资哈尔经学院。大学期间，他深受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家拉希德·里达及其领导的赛莱菲耶改革运动（*Salafiyya Reform Movement*）的熏陶，里达创办的《灯塔》杂志（*Al-Manar*）更是其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sup>①</sup>班纳不满穆斯林数典忘祖、漠视宗教信仰的行为，他感叹道：“埃及大学充满西方生活色彩，实施西方体制，企图以此来使大学世俗化，并进而成为反对宗教、反对传统的场所。”<sup>[2]248</sup>而以爱资哈尔经学院为代表的传统宗教学者（*ulema* 乌里玛）却无能为力，安于遁世，未能履行捍卫伊斯兰教的职责和义务。埃及社会正陷入两种失败价值观的羁绊，使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是外来世俗主义、理性主义的影响和渗透；二是以爱资哈尔为代表的教条式传统主义，它采取的是不问世事、袖手旁观的无为态度和立场。对于广大穆斯林信徒而言，最大的精神创伤莫过于1924年凯末尔废除哈里发制度。正是在伊斯兰传统走向没落的处境之下，班纳决心以传播和恢复伊斯兰信仰为己任。1927年班纳大学毕业后，在伊斯梅利亚一所小学任阿拉伯语教师，后任校长直至1946年辞职。

哈桑·班纳生涯中的第一件大事是在伊斯梅利亚创立穆斯林兄弟会，而穆兄会在伊斯梅利亚得到创立绝非偶然。伊斯梅利亚位于苏伊士运河的中部，是欧洲殖民当局运河管理总部的所在地，运河由英、法管理并驻扎英国占领军，是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象征。正如班纳所说：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在自己的领土上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我们在这里每天都可以看见外国占领和外国资本吮吮祖国财富的种种迹象，这条运河是祖国一切灾难的根源，运河东岸是运河管理局，外国人享受着高官厚禄，住着豪华的寓所，西岸是全副武装的英国占领军，埃及人成了自己国土上的异乡人，成了卑躬屈膝的人。所有这一切都成了这一运动产生的动力和食粮。”<sup>[3]175</sup>此外，以华夫脱党为代表的自由民族主义并没有给埃及带来自由独立，英国殖民者依然继续占领埃及，埃及社会出现大规模的失业、贫穷及腐败，而犹太复国主义又在巴勒斯坦地区跃跃欲试。由于埃及人偏离了伊斯兰教的精神和道德原则，导致了国家的衰败和颓丧，他们需要一种植根于其历史、社会和环境的目标和力量，即回归伊斯兰教方能救民于水火之中。正是在这种考虑下，班纳创建了穆兄会。

1928年3月，6位受雇于英国军营的埃及劳工找到班纳，他们说：“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可言”，他们不过是附属于外国人的佣工……我们不能找到行动之路，而你却能够。”<sup>[4]8</sup>于是，他们请求班纳成为他们的领导人，带领他们走向伊斯兰复兴之路，成为“伊斯兰启示的军队”，班纳庄严地接受重任，他们一起共同组建了“穆兄会”。基于天下穆斯林皆兄弟的情怀，是《古兰经》的一贯诉求，这也是穆兄会得名的由来。<sup>②</sup>哈桑·班纳庄严地宣布：“我们是为伊斯兰效命的兄弟；故我们是‘穆斯林兄弟’。”<sup>[4]8</sup>穆兄会响亮的口号是：“真主是我们的目标。先知是我们的领袖。《古兰经》是我们的宪法。斗争是我们的道路。为真主而殉教是我们最崇高的愿望。真主是伟大的，真主是伟大的。”<sup>[4]193-194</sup>穆兄会是一个全方位的宗教与政治组织，但它既不同于一般性的政治政党，也有别于宗教性的社会团体，按班纳本人的说法，穆兄会是“一个赛莱菲运动、一种正统方式、一种苏菲现实、一个政治实体、一个体育组织、一个科学文化社团、一个经济公司以及一个社会理念。”<sup>[5]146</sup>更为关键的是，穆兄会还致力于社会生活的改造和精神的革命，而哈桑·班纳把这一点看作穆兄会的核心目标，因此他说道：“我的兄弟们！你们不是慈善会社，不是政党，不是目标狭隘的地方组织。相反，你们是这个民族心脏中新的灵魂，以《古兰经》

① *Salaf* 意为“虔诚的始祖”，通常指尤其是指前三代（包括与先知同时的圣门弟子及之后两代）。赛莱菲耶（*Salafiyya*）是指那些主张遵循正确先祖（*al-Salaf al-Salib*）的观点和实践的人，而赛莱菲方法（*Salafi approach*）则要求回归《古兰经》和圣训，将其视之为穆斯林生活的真实规范基础，它强调运用创制 *fiqh*（伊智提哈德），反对盲目仿效（*Taqlid* 塔格里德）。较早倡导赛莱菲观点和途径的人物是罕百勒教法学派的创始人伊本·罕百勒以及该派著名教法学家伊本·泰米叶。

② 《古兰经》说：“信士们皆为教胞，故你们应当排解教胞间的纷争，你们应当敬畏真主，以便你们蒙主的怜悯”（49：10）。参见《古兰经》，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赋予它生命；你们是新灯塔，以知晓真主的光辉来摧毁唯物主义的黑暗；你们是强音，以高亢之音来追忆先知的启示……你们应自认为重任的担当者，当其他人置若罔闻。若有人问你们呼唤什么，回答他们，是伊斯兰，是穆罕默德的启示，一个包含政府、以争取自由为义务之一的宗教！若有人说你们是搞政治的，回答他们，伊斯兰教不承认这种分别。若有人指控你们是革命者，你们就说‘我们是正义与和平之声，我们对此坚信不疑，并为此自豪。如果你们反对我们或者阻止我们传播先知的启示，那么真主允许我们自卫，以反对你们的不义’。”<sup>[4]30</sup>

班纳是一位奇里斯玛型的社会活动家、组织者和宣传家。他与志同道合的信士们举办夜校教育民众，宣传伊斯兰的团结和利他主义精神；他们时常挨家挨户进行宣教，利用清真寺、咖啡馆、俱乐部、私人家庭聚会及郊外旅行等不同方式和场合，大力宣传穆兄会的信条和主张。穆兄会通常以四种方法来实现其目标：1. 宣教 (*al-da'wa*)，借助布道、小册子、报刊杂志和书籍等，宣传兄弟会的观点；2. 教育 (*al-tarbiya*)，教育穆兄会成员和普通民众；3. 灌输 (*al-tawjib*)，灌输所有埃及人接受伊斯兰教法必须统辖生活方方面面的观点；4. 行动 (*al-'amal*)，包括建造清真寺、学校、医院和诊所，提供社会服务。随着 1929 年~1933 年世界经济危机殃及埃及，穆兄会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得到了迅猛发展。大批青年学生、公务员、手工业者、小商贩、城市贫民及农民纷纷向穆兄会靠拢，其人数与日俱增，势力日渐强大。据美国学者米契尔所提供的数据，穆兄会 1929 年仅有 4 个分部，1930 年为 5 个，1931 年为 10 个，1932 年为 15 个，1938 年则猛增至 300 个，1940 年为 500 个，1949 年更是达到难以置信的 2000 个。在 1945 年~1948 年穆兄会全盛时期，其成员约 30 万~60 万人，加之 50 万的同情者，所以 1948 年穆兄会号称有 100 万之众的组织或运动绝非夸大其词。<sup>①</sup>虽然 1949 年班纳遇刺后穆兄会成员数出现大幅度下滑态势，但 1953 年全埃及穆兄会仍然有 1500 个支部，其成员约在 20~30 万之间。<sup>[4]328</sup>更为重要的是，从 20 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开始，穆兄会逐渐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扩散，成为一个庞大的国际性组织。

## 二

哈桑·班纳及其穆兄会的基本世界观植根于罕百勒教法学派。罕百勒教法学派是伊斯兰四大教法学派之一，也是最具保守立场的教法学派，它坚持严格的按照字面含义解释《古兰经》和先知的逊奈。与此同时，伊斯兰现代主义者，诸如阿富汗尼政治行动主义、阿布杜理性现代主义以及里达保守主义等赛莱菲耶学说，也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班纳的世界观和政治行动主义。班纳及其穆兄会主要关心的主题是如何使埃及乃至整个穆斯林社会摆脱外国强权的控制和渗透、消除埃及人民所处的普遍贫困状况、扭转埃及社会所面临的道德沦丧和思想混乱。他认为，惟有复归伊斯兰原旨教义，抵抗西方腐败思想的侵蚀，方能从根本上解决穆斯林社会所招致的深刻危机。班纳告诫其追随者，穆兄会的目标是：第一，使伊斯兰家园摆脱外国的影响；第二，严格按照伊斯兰原则，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运用它的社会准则，倡导它的原则，传播伊斯兰的使命至全人类。哈桑·班纳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伊斯兰教是一个整全的生活方式。依哈桑·班纳，伊斯兰教不只是一个信仰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社会行动的召唤，即致力于改进社会所有领域的社会运动。伊斯兰本身是一个全然且自足的体系 (*the total self-sufficiency of Islam*)，是所有生活领域的最后仲裁者；《古兰经》的启示和先知逊奈的智慧是伊斯兰的源泉和基础；伊斯兰适用于所有的时空环境，超越时

<sup>①</sup> 埃及人口从 19 世纪末开始急剧增加，1897 年埃及人口仅为 970 万，到 1947 年埃及陡升至 1900 万，年平均增长率为 1.4%。不管如何计算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人数，他们无疑占全国人口中相当大的比例。参见 Joel Beinin, "Egypt: Society and Economy, 1923~1952," in M. W. Dal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ume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313.

空的界限即超越性 (transcendence)。作为一个完备体系 (*nizam al-Islam, a holistic Islamic system*) 的伊斯兰教是穆兄会中一个共同接受的概念, 哈桑·班纳指出: “伊斯兰既是崇拜, 又是领导; 既是宗教, 又是国家; 既是精神, 又是行动; 既是礼拜, 又是圣战; 既是顺从, 又是统治; 既是经典, 又是宝剑。二者不可分开。”<sup>[2]249</sup> 穆斯林将伊斯兰教视为真主最后和最完美的启示, 穆罕默德被称为“封印先知”, 真主的启示指引着穆斯林, 将真主的启示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哈桑·班纳也同样抱有这一雄心, 他认为: “假如法国大革命判决了人的权利, 宣布了自由、平等、博爱; 假如俄国十月革命进一步融合不同阶级以及带给人民社会正义, 而伟大的伊斯兰革命早在 1300 年以前就判决了一切。它不将自己局限于任何哲学理论, 而是传播这些原则至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并且增添了人类神圣观念和他的美德完美性以及实现他的精神趋势。”<sup>[4]233</sup> 伊斯兰包含了其他体系的所有美德, 它本身足以实现国家的复兴, 因为历史已经印证了伊斯兰的适应性, 业已展示给人类作为最强大、最高贵、最仁慈、最美德的宗教。埃斯波西托指出, 哈桑·班纳“呼吁回归《古兰经》和先知的逊奈, 使之成为重建伊斯兰政府体系的主要源泉……穆斯林必须追溯过去, 超越所有历史的积淀, 回归到穆斯林历史的早期规范时期——先知和早期哈里发时代”<sup>[6]131-132</sup>。

与上述主张相应, 班纳坚定不移反对埃及社会的西方化、世俗化以及外来思想。他深信西方帝国主义对穆斯林社会不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威胁, 而且是文化上的威胁; 西方化直接威胁了穆斯林的身份、独立和生活方式; 从长远来看, 西方在教育、法律、习俗和价值观上的宗教文化渗透比政治干预更具危害, 因为这危及了穆斯林社团的生存和认同。他宣布: “时至新近, 作家、知识分子、学者和政府都以欧洲文明的原则引以为荣, 赋予自身西方色彩, 采纳欧洲的风格和方式; 今天, 风尚骤变, 保留和不信任占有一席之地。要求回归伊斯兰原则、教义和方式的呼声日渐隆起……开启了这些准则与现代生活相得益彰, 这只不过是最后伊斯兰化的序曲罢了。”<sup>[7]78</sup> 班纳认为: 西方文明赖以建立的社会原则已经遭遇了破产, “西方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建立在实用与技能的知识上, 在发现、发明以及机械产品充斥的世界市场上, 它始终未能对人类的思想提供一丝光明、一线希望、一点信仰, 或者给焦虑不安的人提供哪怕是极为狭窄的通往安宁与平静之途。”<sup>[8]147</sup>

班纳将帝国主义划分为两类: 其一是外部的帝国主义, 它是外国占领者野蛮的、残忍的势力; 其二是内部或国内的帝国主义, 它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最恶劣的背叛, 充其量是冷漠对待穆斯林社团的意志和利益, 主要指与外部帝国主义沆瀣一气的世俗统治精英。内部的帝国主义散布“沮丧和道德失败”, 使埃及人偏离信仰, 堕落后为“死亡的绥靖主义、卑躬屈膝和安于现状”。<sup>[4]218</sup> 埃及拥有璀璨夺目的文化传统, 远优越于舶来品。穆斯林不应该简单复制法国大革命或者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 因为先知穆罕默德早在 1300 年前已经提出了实现自由、平等、博爱以及社会正义的美好蓝图。倘若穆斯林一味地效法外来思想, 那么他们将堕落为卑躬屈膝、丧失自我的“文化杂种”(Cultural Mongrels), 而真正的穆斯林惟有“当你的灵魂拒绝帝国主义, 它将离开你的土地”。

其次, 创造一个伊斯兰秩序 (*Islamic Order, al-nizam al-islami*)。穆兄会的终极目标是创造一个伊斯兰秩序, 伊斯兰秩序实际上就是一个伊斯兰国家, 实行伊斯兰教法 (*sharia* 沙里亚) 的统治。伊斯兰国家是“最完整、最纯洁、最崇高、最尊贵的政治制度, 远比欧洲人说教和论著中的理想政体更为优越。”<sup>[9]48</sup> 埃及必须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 因为其居民的绝大多数都是穆斯林, 所以, 他们有权按照伊斯兰的原则建立一个伊斯兰政体, 正如苏联选择共产主义、西方选择民主制度一样。对班纳而言, “沙里亚的实施与否, 是界定一个真正伊斯兰秩序的决定性因素。”<sup>[10]71</sup> 然而, 班纳及其继承人哈桑·胡代比 (*Hasan al-Hudaybi*) 都认为, 贯彻伊斯兰秩序并非意味着回归先知及其继承人所存在的统治形式。“假如进行改革, 埃及现存的宪政议会框架将能满足穆斯林国家的伊斯兰的政治要求。”<sup>[4]235</sup> 班纳及其后继者规定了伊斯兰国家的三条原则, 即《古兰经》是根本的宪法、按照协商原则 (舒拉) 运行政府以及执行统治者是伊斯兰教义和人民的意志所约束。班纳还宣布,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契约”的关系, 统治者被定义为“受托人”、“代

理人”，因为统治者是国家契约的代理人，他由选举而成，尽管《古兰经》尚未详尽地规定选举的方式方法。诚然，穆兄会追求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的目标，但穆兄会的优先目标是实现社会的伊斯兰化和实施沙里亚（伊斯兰教法），要求用伊斯兰教法代替世俗的法律。<sup>[4]246-247</sup>

在伊斯兰政治中，班纳反对当今盛行的政党政治（partyism, hizbiyya）。他认为，政党政治是由个人的贪婪和自私自利所驱使的，缺乏规划和目标，势必导致分裂的滋生蔓延。在现实生活中，政党不过是资本主义剥削压榨和利用人民的政治工具，政党和其领导人的腐败，导致了议会制度和民主政府的失败。所以，他要求禁止所有的政党、结束政府的腐败、强化司法的独立、扩大政府对教育和公共道德的监督作用。“他所憧憬的是一个没有政党政治、没有阶级对立、没有个人或者群体利益的合理差别的伊斯兰乌托邦，是乌托邦式的马克思无阶级社会的伊斯兰相等物。然而，就兄弟会而论，这一乌托邦的未来实现是基于复归存在于过去的、先知穆罕默德和正确指导的哈里发时代的乌托邦。”<sup>[5]146</sup> 哈桑·班纳的政治主张是一种典型的具有怀旧倾向的政治浪漫主义。美国学者帕特丽夏·克隆一针见血地指出，倡导复归“尚古主义的乌托邦”（Primitivist Utopia）即所谓伊斯兰的“黄金时代”（大约从公元 632~661 年）是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标志性特征，该思想认定最早时期的伊斯兰岁月是最为美好的时光，简单朴素的社会是最具美德的社会。<sup>[11]318</sup>

在经济领域中，哈桑·班纳反对资本主义，提倡社会正义。埃及经济制度的两个形象是，财富和土地的不公正分配，以及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兄弟会要求实现工业的国有化、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反对对工人的剥削压榨、建立提供无利息的伊斯兰银行、为民众提供社会福利计划等。<sup>[12]73-74</sup> 为此，班纳提出伊斯兰经济的 10 项原则：正当的财富是生活的支柱，应当珍惜、妥善使用和发展；为每一个有能力工作者安置工作，每人都自食其力；开发自然资源，充分利用人力和物力；严禁取不义之财；缩小阶级差别，要基本消灭豪富和赤贫；每个公民享有社会保障、生命保险；鼓励多施舍，穆斯林之间要互助合作，互相帮助；私人财产不受侵犯，不妨害公共利益的私有财产应受到保护；依据公正慈善原则组织贸易，认真搞好金融；上述各项规定和原则，国家负责监护执行。<sup>[3]184-185</sup>

再次，在实现伊斯兰国家的途径方面，力主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化。班纳主张，通过宣教和教育的方式，首先改变个人、家庭，然后社会，最后水到渠成地改变国家。他认为：“我们穆兄会的义务是藉由加入至高的真主，致力于自身的、心灵的改革，然后组织我们的社会，利用劝善诫恶去改造形形色色的社区，在社区的基础上一个美好的国家将应运而生。”<sup>[13]48</sup> 与南亚次大陆伊斯兰主义者毛杜迪及其伊斯兰促进会所主张的自上而下的策略不同，班纳致力于自下而上的战略，首先使社会伊斯兰化，然而再使国家政权伊斯兰化，亦即这场伊斯兰革命将首先是一场社会革命而非暴力的政治革命，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建立首先需要通过渐进的社会变革来实现社会的伊斯兰化。约翰·沃尔指出：“尽管他相信改革的权力与统治的权力密不可分，但是班纳坚持穆斯林兄弟会致力于广泛的社会改革，不是直接实施政治权力。”<sup>[14]366</sup> 尽管如此，这一战略也不妨碍穆兄会在 20 世纪四十年代初涉及政党政治。但在整体上，“班纳和社会（意指穆兄会）有着一个传统纲领，只有当国家真正地实现伊斯兰化，并且准备接受穆兄会所代表的原则时，穆兄会方能实施权力。”<sup>[4]103</sup>

班纳十分注重圣战（Jihad 吉哈德）在造就伊斯兰国家中的作用。圣战是穆兄会宗教政治词汇中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在 20 世纪四十年代，班纳撰写了一本 20 多页的小册子中，他呐喊道：“真主诫命穆斯林进行圣战，不是为了侵略目的，也不是作为达到个人愿望之手段，而是为了保护作为和平保障的伊斯兰教之彰显，也是为穆斯林履行所肩负的伟大使命之手段，正是这一使命引导人们走向真理和正义。伊斯兰教祝愿和平，战斗是义不容辞之举，正如《古兰经》所言，‘如果他们倾向和平，你们就应当倾向和平，应当信赖真主。’”<sup>[15]98</sup> 圣战不仅是通过武装斗争、从西方殖民主义者手中解放穆斯林土地，而且也是穆斯林内心世界的致力，摆脱根深蒂固的自卑感、宿命主义和消极遁世，“最大的圣战是在暴君面前直面真理”<sup>[12]83-84</sup>。班纳否定了所谓“大吉哈德”高

于“小吉哈德”的观点，强调暴力圣战的重要性，称颂死亡是圣战的重要目的，为主道而殉教(*Shahid* 舍西德)是高尚的死亡。他声称：“‘死亡是艺术’，《古兰经》命令人们热爱死亡胜于热爱生命，除非‘《古兰经》的死亡哲学’代替了‘生命的热爱’那么他们将一无所有，胜利仅来自于对‘死亡艺术’的掌握。”<sup>[4]207</sup> 他坚持没有矢志不渝和坚忍不拔的圣战，伊斯兰运动不会成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穆兄会将《古兰经》置于两把宝剑之中，上写“时刻准备着”的图案作为自己的标志。

最后，倡导泛伊斯兰主义。或许没有其他任何事情比得上对于穆斯林分裂，继而使穆斯林社团削弱，占据着班纳的身心，始终致力于建立一个涵盖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乌玛”(umma 社团)。<sup>①</sup> 班纳提出：“所有的穆斯林是一个民族，伊斯兰祖国是一个国家。”<sup>[16]209</sup> 主张“宗教信仰的联系高于血缘(民族)的联系，高于地缘(国家)的联系”。<sup>[3]180</sup> 他把这种关系比作“环节”或“环围”。以埃及为例，先是爱国主义——即埃及圈；其次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即阿拉伯圈；第三是泛伊斯兰主义——即伊斯兰圈；最后是人类主义或世界大同——即世界圈。在班纳看来，民族主义不啻是一个危险的原则，只会产生邪恶、罪过、战争、纷争、争斗和倾轧。而伊斯兰祖国则高于地域爱国主义和血统爱国主义范畴的东西，它已上升为具有崇高原则和纯正、正确信仰的爱国主义。在适当的范围内，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是相容的。穆兄会是一个接受且超越民族主义的宗教运动，民族主义只不过是真主更大社团的一部分。<sup>[5]148</sup> 他进一步提出：“在穆斯林世界中，埃及所占据特立独行的地位和作用，因为正如埃及的改革始于伊斯兰，所有伊斯兰的再生必须始于埃及，因为无论是在理想抑或历史的意义上，‘国际伊斯兰’的重生首先要求一个强大的‘穆斯林国家’(Dawla Muslima)。”他说：“在尼罗河、阿拉伯世界、直至安拉祝福伊斯兰信条的每一个土地，终极目标是团结世界上的穆斯林组成一个伊斯兰国家。”<sup>[4]232</sup>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胡拉尼指出，19世纪以来中东地区出现了三种民族主义类型，此即族群或语言、领土和宗教的民族主义。<sup>[17]341-343</sup> 而穆斯林兄弟会即是宗教民族主义的体现，但这种宗教民族主义远远超越了单纯宗教的范畴，它包含了从政治到社会、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内容。

### 三

20世纪二十年代末迄今，富于战斗精神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和思潮日益成为与西方乃至穆斯林国家内部世俗威权主义政权相抗衡的一种社会、政治和文化力量。与伊斯兰世界昔日的荣光恰成对比，新旧殖民主义给伊斯兰世界带来贫困、痛苦和压迫，这在亿万穆斯林心中引起了普遍的激愤不平。在西方的经济剥削和掠夺之外，伊斯兰世界更难以忍受的是西方世俗文化的侵蚀以及阿以冲突中的惨败。与此同时，遍布在穆斯林世界内部形形色色的威权主义政权并未给广大穆斯林民众带来人们所期盼的政治自由、社会正义、经济繁荣、国家富强。而政治伊斯兰运动充分代表了本土化的意识形态，它一方面拒斥“西方的霸权”，另一方面企图寻找解脱穆斯林发展困境的钥匙，这给穆斯林带来了新的光明和希望。可以说，哈桑·班纳及其穆兄会恰好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哈桑·班纳的思想始终围绕着埃及、伊斯兰教和西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展开，并试图在现代西方化的时代潮流中探索出切合于埃及本土的发展道路。班纳认为伊斯兰能为人的精神提供完美的境界，这是西方文化不能望其项背的。因此他主张，伊斯兰国家应摆脱西方大国的主宰，在伊斯兰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切合于本土的宗教、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秩序。与赛义德·库特卜、霍梅尼等人相比较，一方面，哈桑·班纳的政治纲领具有强烈而坚定的复兴主义性质，但另一方

<sup>①</sup> 乌玛(ummah)，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部落”、“族人”，引申为社团、社群、公社等，系指信仰者的全球性社团，它宣布信仰“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安拉)，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的信条；乌玛代表了“来自不同文化和地理境况的穆斯林期盼本质上团契和理论上平等的理想”。参见 John L. Esposito, eds.,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Isl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27。

面，他在政治策略上又表现出了更多的务实色彩和温和取向。班纳的思想与活动对穆斯林兄弟会以至整个伊斯兰运动既有创始之功又保持着持续不断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1] John L. Esposito. *The Islamic Threat: Myth or Realit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2] 陈嘉厚. 现代伊斯兰主义[M].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
- [3] 蔡德贵. 当代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4] Richard P. Mitchell. *The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5] L. Carl Brown. *Religion and State: The Muslim Approach to Politic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 [6] John L. Esposito. *Islam and Politics* [M].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7] Hasan al-Banna. *The New Renaissance*[M].// John L. Esposito and John J. Donohue, eds., *Islam in Transition: Muslim Perspectiv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8] 哈桑·班纳. 昔日:伊斯兰世界新复兴的方向[M].// 凯马尔·H·卡尔帕特. 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9] Hasan Al-Banna, *Five Tracts of Hasan Al-Banna (1906-1949): A Selection from the Majmu'at at Rasail Al-Iman Al-Shahid Hasan Al-Banna* [M].trans. and annot. Charles Wende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10] Mohammed Ayooob. *The Many Faces of Political Islam: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Muslim World* [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 [11] Patricia Crone. *God's Rule: Government and Islam*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2] Brynjar Lia. *The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 in Egypt: The Rise of an Islamic Mass Movement, 1928- 1942*[M]. UK: Ithaca Press, 1998.
- [13] Sami Zubaida. *Islam, the People, and the State* [M]. London: Routledge, 1989.
- [14] John O. Voll. *Fundamentalism in the Sunni Arab World* [M]// Martin E. Marty and R. Scott Appleby. *Fundamentalism Observ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15] David Cook. *Understanding Jihad* [M].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 [16] 金宜久. 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 [17] Albert Hourani. *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98-1939*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On Hasan al-Banna's Political Islam Thought

HU Yu & OU Dongming

**Abstract** As the founder o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Egypt, Hasan al-Banna's thoughts and practices play a vital role. Banna's political Islam thoughts mainly present as follows: strive to explain Islam as a holistic system and then create a thoughtful justification for Islamic order; set out the political platform of an Islamic state, and oppose to Muslim societies' Westernization and secularization; commit to Islamization from bottom to top, and emphasize on Jihad's role in Islamic state-building, and advocate for pan-Islamism in the world. By way of digging out and clarifying his thoughts, we better recognize the origin and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Islam movement.

**Key Words** Political Islam;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slamic Order; Jihad; Umma; Islamic Thoughts

(责任编辑: 孙德刚)